

汉藏语系的数量名结构*

惠红军

提 要 文章对汉藏语系的数量名结构进行了系统分析,共发现了“数+量+名”“名+数+量”“名+量+数”“量+名+数”四种语序类型。其中“量+名+数”是一种数量分裂型结构,也是国外类型学研究中认为不可能存在的一种结构类型,其余三种是数量一致型结构,其内部具有共同的层次性,而且“量+名+数”和“数+量+名”之间还具有蕴含关系。在句法结构上,量词倾向于与数词(而不是名词)的位置移动保持一致,但在语义关系上,量词与名词却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关键词 数量一致型 数量分裂型 蕴涵关系 距离象似

○ 引 言

汉藏语系的数词、量词、名词形成的结构(以下简称“数量名结构”)具有非常重要的语序类型学价值。虽然已有研究关注到这一现象(刘丹青 2002;李云兵 2005、2008;黄平 2012;程博 2012),但遗憾的是,数量名结构的语序一直以来并没有引起更多的类型学思考。正如刘丹青(2002)曾指出的那样,现有的语序类型学研究多没有把量词考虑在内;其原因在于汉藏语的量词属于指称类定语,而汉藏语的指称类定语的情形更加复杂。

本文从类型学的视角系统考察了汉藏语系的数量名结构,发现其中存在三个颇有意义的现象。其一,汉藏语系共有“数+量+名”“名+数+量”“名+量+数”“量+名+数”四种语序类型;其中“量+名+数”是一种数量分裂型结构,也是 Greenberg(1972)认为不可能存在的一种结构类型;其余三种则是数量一致型结构,其内部具有共同的层次性。这些语序中还存在着一种蕴涵关系,即“量+名+数 \supset 数+量+名”。其二,在显性的句法结构上,量词倾向于与数词(而不是名词)的位置移动保持一致。其三,在隐性的语义关系上,量词与名词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一 汉藏语系数量名结构的语序类型

根据马学良(2003)对汉藏语系各语言的系属分类以及其他学者的有关研究,我们对比分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汉语量词的认知类型学研究”(编号:17FYY012)、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汉语量词的认知类型学研究”(编号:2014J02)的部分成果。本文参加了 2016 年 10 月在武汉举办的中国民族语言学会第十二次全国学术讨论会,王双成教授曾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谨致谢忱。文中如有问题,概为作者之责。

析了汉藏语系中 46 种语言的数量名结构,共得到四种语序类型:“数+量+名”“名+数+量”“名+量+数”“量+名+数”。前三种类型中,数词、量词或共同置于名词之前,或共同置于名词之后,但均共置于名词的同一侧,因此称之为数量一致型结构;后一种类型中,数词和量词分置于名词的两侧,因而称之为数量分裂型结构。

1.1 数量一致型结构

1.1.1 数+量+名

这种结构分布于汉语、苗瑶语族和壮侗语族的一些语言中,在汉语、苗语、布努语、勉语、畲语、侗语、水语、毛南语、拉珈语、仡佬语、佯僂话、莫话、甲姆话、黎语、壮语、布依语、傣语、仡佬语、临高话中都能见到。如:

汉语:两张嘴 五片肉 一条街

苗语(王辅世 1985:56):

i ³³ le ³³ li ⁴⁴ 一个碗	o ³³ te ¹¹ pa ⁴⁴ 两只猪
一 个 碗	二 只 猪

水语(张均如 1980:31):

ci ⁵ to ² tak ⁸ kui ² 四只公牛	ti ³ sum ⁵ dwa ¹ 一撮盐
四 只 公 水 牛	一 撮 盐

1.1.2 名+数+量

这种结构主要分布于汉语、藏缅语族和壮侗语族的一些语言中,在汉语、羌语、普米语、嘉戎语、道孚语、扎坝语、却域语、贵琼语、木雅语、史兴语、彝语、傈僳语、哈尼语、拉祜语、纳西语、基诺语、载瓦语、阿昌语、独龙语、白语、怒语、土家语、克伦语、傣语、临高话中能够见到。如:

汉语:纸两张 肉五片 鸡两只

彝语(翟会峰 2011:60):

ni ³³ tha ²¹ tɕhie ³³ 一头牛	sei ³³ tha ²¹ dzie ³³ 一棵树
牛 一 条	树 一 棵

傣语(马学良,2003:719):

pa ¹ sa:m ¹ to ¹ 三条鱼	sə ² sɔŋ ¹ phu:n ¹ 两件衣服
鱼 三 条	衣 两 件

1.1.3 名+量+数

这种结构分布于藏缅语族和壮侗语族的一些语言中,在藏语、门巴语、景颇语、珞巴语、僜语、克伦语、傣语、临高话中能够见到。如:

藏语(多杰东智 2005):

nə nda hsəm 三个人	htsa hkaŋ tɕək 六根草
人 个 三	草 根 六

景颇语(徐悉艰 1987):

u ³¹ khum ³¹ mji ³³ 一只鸡	n ³³ ku ³³ tum ⁵⁵ mji ³³ 一粒米
鸡 只 一	米 粒 一

傣语(马学良 2003:719):

xim ¹ lim ³ nuŋ ⁶ 一根针	ho ² to ¹ nuŋ ⁶ 一头黄牛
针 根 一	黄牛 头 一

1.2 数量分裂型结构

数量分裂型的“量+名+数”结构分布于苗瑶语族和壮侗语族的一些语言中,在壮语、布依语、毛南语、傣语、莫话、甲姆话、苗语这些语言中能够见到。如:

壮语(张元生 1993):

kai⁵ fei² sa:u deu¹ 一块肥皂 kai⁵ ka:u¹ deu¹ 一块糕
块 肥皂 一 块 糕 一

布依语(吴启禄 1992:114,116):

tu² mu¹ diau¹ 一头猪 bau¹ sa¹ diau¹ 一张纸
只 猪 一 张 纸 一

1.3 四种语序的分布对比

我们把上文所分析的 46 种语言的数量名结构的语序类型进行了对比,结果如表一所示:

表一 汉藏语系 46 种语言的数量名结构的语序类型分布

语种	数量一致型结构			数量分裂型结构	资料来源
	数+量+名	名+数+量	名+量+数	量+名+数	
汉语	+	+			
藏 緬 语 族	藏语		+		多杰东智 2005
	门巴语			+	陆绍尊 1986
	羌语		+		孙宏开 1981
	普米语		+		蒋颖 2008
	嘉戎语		+		马学良 2003
	道孚语		+		黄平 2012
	扎坝语		+		黄布凡 1990
	却域语		+		蒋颖 2006
	贵琼语		+		孙宏开 1983
	木雅语		+		马学良 2003
	史兴语		+		徐丹 2009
	景颇语			+	戴庆厦、蒋颖 2005
	彝语		+		陈士林、边仕明、李秀清 1985
	傣语		+		徐琳、木玉璋、盖兴之 1986
	哈尼语		+		马学良 2003
	拉祜语		+		常肱恩 1986
纳西语		+		马学良 2003	

语种	数量一致型结构			数量分裂型结构	资料来源	
	数+量+名	名+数+量	名+量+数	量+名+数		
藏缅语族	基诺语		+		马学良 2003	
	载瓦语		+		马学良 2003	
	阿昌语		+		马学良 2003	
	珞巴语			+	欧阳觉亚 1985	
	僂语			+	黄平 2012	
	独龙语		+		杨将领 2011	
	白语		+		徐琳、赵衍荪 1984	
	怒语		+		马学良 2003	
	土家语		+		田德生 1986	
	克伦语		+	+	马学良 2003	
苗瑶语族	苗语	+		+	罗安源 2005	
	布努语	+			毛宗武、蒙朝吉、郑宗泽 1982	
	勉语	+			毛宗武、蒙朝吉、郑宗泽 1982	
	畲语	+			毛宗武、蒙朝吉 1982	
壮侗语族	侗语	+			龙耀宏 2003	
	水语	+			韦学纯 2011	
	毛南语	+		+	张景霓 2005	
	拉珈语	+			马学良 2003	
	仡佬语	+			王钧、郑国乔 1980	
	佯僂话	+			马学良 2003	
	莫话	+		+	马学良 2003	
	甲姆话	+		+	马学良 2003	
	黎语	+			欧阳觉亚、郑贻青 1980	
	壮语	+		+	张元生 1993	
	布依语	+		+	吴启禄 1983	
	傣语	+			+	贾琳瑛 2012
			+	+		李明 2007
	临高话	+	+	+	张元生等 1985	
仡佬语	+				张济民 1993	

为了更清晰地观察数量名结构的四种语序类型在汉藏语系各语族中的分布情况,我们将表一简化为表二:

表二 数量名结构的语序类型在汉藏语系各语族中的分布

	数量一致型结构			数量分裂型结构
	数+量+名	名+数+量	名+量+数	量+名+数
汉语	+	+		
藏缅语族		+	+	
苗瑶语族	+			+
壮侗语族	+	+	+	+

根据表一,我们所考察的46种语言的数量名结构中都能够发现数量一致型结构,占统计总量的100%;其中,有7种语言既存在数量一致型结构,又存在数量分裂型结构,占统计总量的15.2%;有39种语言只有数量一致型结构,占统计总量的84.8%。

在有数量分裂型结构“量+名+数”的7种语言中,有6种语言属于壮侗语族,即壮语、布依语、傣语、毛南语、莫话、甲姆话;只有1种语言属于苗瑶语族,即苗语,而且我们也仅在罗安源(2003:80)有关松桃苗语的材料中见到1例数量分裂型“量+名+数”结构:

a⁴⁴ ntu⁵⁴ wu³⁵ a⁴⁴ na⁴² mæ²² qwen⁴⁴ a⁴⁴! 那一条河那么宽啊!

那 条 河 一 那 么 宽 啊

由此可见,苗语中是否普遍存在数量分裂型“量+名+数”结构还不十分确定;因此,苗瑶语族数量名结构的主要类型应为“数+量+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数量分裂型“量+名+数”结构是壮侗语族的一种独特语序。但是,当我们统计的46种语言的数量名结构类型归纳和简化为表二时,数量分裂型结构在分布上的这种独特性则被遮掩了。

二 汉藏语系数量名语序的层次性和蕴涵关系

2.1 汉藏语系数量名语序的层次性

上文的分析能够表明,汉藏语系的数量名结构的语序类型差异明显,很难找到一种共存于各语言的语序类型;但我们能够发现一种共性表现,即各语言的数量名结构中都存在着数量一致型结构。这种数量一致型结构内部都具有同样的层次性。如汉语的“数+量+名”和“名+数+量”结构,其中的数词和量词首先会形成一个结构体,名词则是与数词、量词所形成的结构体发生关系,而不是单独与数词或量词发生关系。因此,汉语的数量名结构具有如下的层次性:

[[数+量]+名] [名+[数+量]]

藏缅语族的“名+数+量”和“名+量+数”两种结构中,名词也同样是与数词、量词所形成的结构体发生关系,而不是单独与数词或量词发生关系。因此,藏缅语族的数量名结构具有如下的层次性:

[名+[数+量]] [名+[量+数]]

由于同样的原因,苗瑶语族的“数+量+名”结构具有如下的层次性:

[[数+量]+名]

壮侗语族的“数+量+名”“名+数+量”“名+量+数”结构具有如下的层次性:

[[数+量]+名] [名+[数+量]] [名+[量+数]]

可见,汉藏语系各语族的数量名结构虽然语序类型各有不同,但其数量一致型结构却都具

有共同的层次性。

需要注意的是,表二的数据表明,壮侗语族的数量名结构最为复杂,共有四种语序;但这四种语序实际上可以分为两类。其中“名+量+数”与“名+数+量”可分为一类,它们之间具有转化关系;“量+名+数”与“数+量+名”可分为一类,它们之间既有转化关系,也有蕴涵关系。

我们说壮侗语族的“名+量+数”与“名+数+量”之间具有转化关系,是由于当数词为“一”时,数量名结构就呈现为“名+量+数”;当数字为“二”或大于“二”的数字时,其语序则为“名+数+量”。如德宏傣语和西双版纳傣语:

德宏傣语(克原秀 2011):

lai ² pap ⁵ ləŋ ¹ 一本书	kon ² sa:m ⁶ ko ⁵ 三个人
书 本 一	人 三 个

西双版纳傣语(李明 2007:25、34):

ho ¹ həm ¹ xeu ³ nuŋ ⁶ 一瓣蒜	kai ⁵ səŋ ¹ xəŋ ¹ 两笼鸡
蒜 瓣 一	鸡 两 笼

临高话的数量名结构也有类似情况。即,当数字为“一”时,其语序是“名+量+数”;当数字为“二”或大于“二”的数字时,其语序是“名+数+量”或“数+量+名”。如:

临高话(张元生等 1985:124~125):

dun ³ dun ³ hə ³ 一棵树	dak ⁸ hiu ² hə ³ 一条绳
树 棵 一	绳子 条 一
kai ¹ tam ¹ hu ² 三只鸡	laŋ ³ vən ³ mɔ ²⁸ 两个帽子
鸡 三 只	帽子 两 个
tam ¹ mɔ ²⁸ lan ² 三个房子	vən ³ hu ² ba ¹ 两条鱼
三 个 屋	两 条 鱼

“量+名+数”和“数+量+名”的关系则相对复杂。在壮语、金平傣语、毛南语、布依语等语言中,数字为“一”时,数量名结构的语序为“量+名+数”;而数字为“二”或大于“二”的数字时,其语序是“数+量+名”。因此,这二者之间也是一种转化关系。如:

壮语(马学良 2003:711):

ko ¹ fai ⁴ ʔdeu ¹ 一棵树	so:ŋ ¹ ko ¹ fai ⁴ 两棵树
棵 树 一	两 棵 树

金平傣语(贾琳瑛 2012:15):

ko ³³ mǎi ³¹ nuŋ ⁵² 一棵树	so:ŋ ³³ ko ³³ ɲa ²⁵ 两棵草
棵 树 一	两 棵 草

毛南语(马学良 2003:733):

zəŋ ² mai ⁴ ʔdeu ² 一棵树	sa:m ¹ ni ¹ taŋ ⁵ 三张凳
棵 树 一	三 张 凳

布依语(吴启禄 1992:114、129):

tu ² mu ¹ diau ¹ 一头猪	ɣa ³ dan ¹ tsa ¹ 五个碗
只 猪 一	五 个 碗

2.2 汉藏语系数量名语序的蕴涵关系

在系统分析汉藏语系 46 种语言的数量名结构的语序类型之间的关系后,我们还能够得到

表三 汉藏语系数量名结构中的蕴涵关系

+(量+名+数), +(数+量+名)	-(量+名+数), +(数+量+名)
* (+ (量+名+数), - (数+量+名))	-(量+名+数), -(数+量+名)

这个四分表意味着汉藏语系的数量名结构中存在这样一种蕴涵关系:

$$\text{量+名+数} \supset \text{数+量+名}$$

这种蕴涵关系在汉藏语系中的具体表现是:汉藏语系中存在既有“量+名+数”结构、也有“数+量+名”结构的语言,如毛南语、壮语、布依语、傣语、莫话、甲姆话、苗语等;汉藏语系中存在无“量+名+数”结构而有“数+量+名”结构的语言,如汉语、仡佬语、布努语、勉语、畲语、侗语、水语、仡佬语、佯僂话、黎语等;汉藏语系中存在既无“量+名+数”结构、也无“数+量+名”结构的语言,藏缅语族的语言都是如此,如藏语、景颇语、彝语、白语、羌语、怒语等;汉藏语系中尚未发现有“量+名+数”结构而无“数+量+名”结构的语言。

比较而言,汉藏语系中,“量+名+数”结构是一种劣势语序,在6种语言中能够发现用例;而“数+量+名”结构则是一种优势语序,在19种语言中能够发现用例。

三 汉藏语系数量名结构的限制因素

3.1 汉藏语系数量名结构的独特表现

从组合的角度看,数词、量词和名词会有6种可能的语序结构:

- I. 数+量+名
- II. 名+数+量
- III. 量+数+名
- IV. 名+量+数
- V. 量+名+数
- VI. 数+名+量

Greenberg(1972)认为,只有前四种结构是可能的数词分类词结构(numeral classifiers construction)。而数词分类词即本文所讨论的量词。Greenberg(1972)所认为的4种可能的语序类型I、II、III、IV,也是我们上文所分析的数量一致型结构;不可能的语序类型V和VI则属于数量分裂型结构。Greenberg(1975)认为,语序I和语序II相对于语序III和语序IV更常用,语言也允许在语序I和语序II之间的有序转化。

实际上,数量名结构的可能语序类型多于Greenberg(1972)所说的4种,因为我们在壮语、布依语、傣语、毛南语、莫话、甲姆话、苗语等语言中能够看到一种数量分裂型结构,即V“量+名+数”。因而,汉藏语系的数量名结构是由3种数量一致型结构“数+量+名”“名+数+量”“名+量+数”,和1种数量分裂型结构“量+名+数”构成,这是汉藏语系作为量词型语言在语序上的独特表现。

目前所看到的语序分布还表明,汉藏语系中数量名结构不仅能够于语序I和语序II之间有序转化,而且还能够在更多的语序之间有序转化。如汉语能够在语序I“数+量+名”和语序II“名+数+量”之间有序转化,壮语、布依语能够在语序I“数+量+名”和语序V“量+名+数”之间有序转化;有的语言还能在3种语序结构之间有序转化,如临高话能够在语序I“数+量+名”、语序II“名+数+量”和语序IV“名+量+数”3种语序之间有序转化;有的语言能够在4种语序结构之间有序转化,如傣语能够在语序II“名+数+量”和语序IV“名+量+数”之间、语序I“数+量+名”和语序V“量+名+数”之间有序转化。

3.2 汉藏语系数量名结构的限制因素

3.2.1 距离象似原则和概念关系的制约

数量名结构的语序呈现这种分布的原因是由于距离象似原则的制约,而距离象似原则又受制于概念关系的制约。也就是说,一般情况下,概念关系相近的两个语言单位在句法结构层面的距离也相近,概念关系较远的两个语言单位在句法结构层面的距离也较远。已发现的五种语序结构中,I、II、III、IV四种语序都是数量一致型结构,其中的数词和量词在句法结构上的距离始终都是最近的,这反映出其概念关系也始终是最近的。因为数词、量词同属量范畴,二者之间的概念关系更为紧密;而名词属于事物范畴,与量范畴分属不同范畴,二者之间的概念关系较远;量词一般并不首先与名词发生句法结构上的关系。但语序V“量+名+数”则不同,它是一种数量分裂型结构,数词和量词分别置于名词的两边,二者在句法结构上的距离明显加大,在概念关系上显得疏远;因而这类结构中会有一些特殊的句法表征,如“量+名+数”中的数词都是“一”。同样,由于在概念关系层面应该距离最近的数词和量词却被分置于名词的两侧,因而语序VI“数+名+量”还未见到实际用例。

3.2.2 隐性语义结构的制约

在显性的句法结构层面,汉藏语系数量名结构中的量词和数词在句法位置的移动上更倾向于保持一致;量词一般并不直接和名词发生句法结构上的关系。然而,在隐性的语义结构层面,数量名结构中的量词与名词则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 名量词在起源上与名词的关系非常密切

汉藏语系数量名结构中的量词是一般所谓的名量词,而名量词在起源上与名词的关系非常密切。汉藏语系语言名量词的早期形式,无论称其为临时量词(管燮初 1981:179)、反响类别词(桥本万太郎 1985:97~102),还是称其为拷贝型量词(李宇明 2000),都是以重复名词的形式而出现的。而目前一般所说的名量词,无论是从普通名词演变而成,还是从普通动词演变而成,它们也往往是受名词的某种语义特征的影响而语法化为名量词的。如汉语名量词的产生,据王力(1980[2004]:279),一般说来,单位词是由普通名词演变而成的,并且它们的语法意义就是由它们的本来意义引申的,如“颗”的本义是“小头”,后用作单位词,就指称小而圆的东西。那些来自动词的名量词也是如此。据王力(1980[2004]:279)，“张”字本来是“张弓”的意义,所以弓弩用“张”作为单位词。据刘世儒(1965:127、134)，“件”的本义是指把物分成几块,由此引申,就可以把它作为计件的名量词;“乘”作为量词由“乘载”义引申而来,原是常用于兵车的,后来就逐渐一般化了。佧佬语的一些名量词也是从动词分化来的,用来指动作行为的结果所形成的单位量,如 $\eta\alpha^5$ (一) $\eta\alpha m^1$ (把) hu^3 (米)中的 $\eta\alpha m^1$ (把)其实就是动词 $\eta\alpha m^1$ (抓)。(王钧、郑国乔 1980:47)傣语借用动词作名量词,一般强调该动作所导致的结果状态,如 $x\alpha u^3$ (米) $k\alpha p^9$ (捧) $nu\eta^6$ (一)中的 $k\alpha p^9$ (捧)就是动词借用作名量词,指两手托起的物体的量。(李明 2007:25)

(二) 名量词的词缀化

汉藏语系很多语言的名量词都可以作为一种构形词缀,和名词构成该名词的另一种词汇形式。这种构词形式可以看作是第一种表现的进一步发展,或称作名量词的词缀化。因为名量词实际反映了名词的某种语义特征,因而名量词的词缀化现象可以视为名词的这种语义特征的凸显标志。这种情况在汉藏语系中很常见。如:

汉语:纸张、马匹、花朵、人口、书本、官员、车辆

壮语名量词“词头化”后,失去表示事物单位的意义,只表示事物的类属。如(覃晓航 2005):

tu²原是表示动物一类的量词。

tu² peu⁵ 豹子

豹

tu² puk⁷ 白蚁

白蚁

ko¹原是表示植物一类的量词。

ko¹ puk⁸ 柚树

柚

ko¹ dok⁷ 竹子

竹

布依语名量词也有词缀化现象,用来构成名词的另一种形式。如(吴启禄 1983):

pu⁴“个”,用于人物类

pu⁴ vuun² 人

人

pu⁴ a³ 汉族

汉族

tu²“只”,用于动物类

tu² kuk⁷ 老虎

虎

tu² jok⁸ 鸟

鸟

ko¹“棵”,用于植物类

ko¹ na¹ 草

草

ko¹ tau² 桃树

桃子

fa⁶“把”,用于生产工具类

fa⁶ mip⁸ 刀子

小刀

fa⁶ liam² 镰刀

镰刀

拉珈语也有类似情况,在名词前面加量词表示类别。如(蒋颖 2006:32):

mi²⁴ khje⁵¹ 梳子

条 梳子

mi²⁴ fan⁵¹ 竹子

条 竹子

tu²³¹ linj²³¹ 猴子

只 猴子

tu²³¹ kai⁵⁵ 鸡

只 鸡

(三)名量词的指称功能

汉藏语系很多语言的名量词都具有指称功能,能够用来指称所修饰的名词。如:

苗语(王辅世 1985:60):

te¹¹ zu⁴⁴ 小的(指动物)

只 小

teo⁵⁵ ta³⁵ 长的(指条状物)

条 长

水语(张均如 1980: 35、55、64):

la:k⁸ to² na² 你的那件(衣服)

件的 你

tiu² to² he¹ 人家的(那)条

条的 人家

lam¹ ha:n³ 红的那个

个 红

to² pja:u⁵ 跑的那只

只 跑

彝语的名量词也具有指称功能。在三官寨彝语中,光杆量词在句中可以修饰名词,表示定指。如(翟会峰 2011:61、62):

tsho³³ zo²¹ njei¹³ ma⁵⁵ tʃu²¹. 这个人我不喜欢。

人 个 我 否定 喜欢

na²¹ dzu³³ thɿ³³ thu³³ ka³³ tɰ³³ dɿ³³ ʔa²¹ dɿ³³ ko³³ ka³³ o³³? 你把(这)张桌子搬哪儿?

你 桌 子 张 受格 搬 介 哪儿 完成

mo³³, khu²¹ thu⁵⁵ vei¹³ xu³³. (这)只什么时候买的?

只 停顿 什么 时候 买 陈述

汉语的名量词也具有指称功能,这在普通话和方言中都能见到。如:

普通话:“家”既不是家,又是个家,或者说它没有家的资格却有着家的性质,个中滋味一言难尽。(莫怀戚《透支时代》)

粤语广州方言(施其生 1996):食埋支烟走人!(抽完这支烟就走!)

吴语苏州方言(潘悟云、陶寰 1999):支钢笔是啥人个?(这支钢笔是谁的?)

桂南平话(步连增 2011):个手机 o³³ 电池冇有点□k²¹³,用冇得。(这个手机电池没电了,用不了。)

总而言之,虽然汉藏语系的名量词在语序变化上倾向于和数词保持同步;但它在来源上受名词的明显影响和制约,能够作为词缀和名词复合成词,还可以用来指称名词。因此,汉藏语系的数量名结构既能够表现为数量一致型结构,也能够表现为数量分裂型结构。

四 余 论

量词虽然不能作为汉藏语系同源的证据,但从它经历了从少到多、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趋势来看,它们似乎又有一个共同的内在机制在起作用(孙宏开、胡增益、黄行 2007:106)。汉藏语系各语言的数量名结构的共时分布也许隐藏着这些结构历时演变的信息和轨迹,而其演变的年代跨度也可能远远超出我们一般的估计。因此,对汉藏语系数量名结构的系统研究有助于汉藏语系量词研究的深入,或能挖掘出量词起源上的诸多动因。

参 考 文 献

- 步连增 2011 《南方汉语中量词定指现象来源初探——以桂南平话为例》,《语言研究》第3期。
- 常贻恩 1986 《拉祜语简志》,北京:民族出版社。
- 陈士林、边仕明、李秀清 1985 《彝语简志》,北京:民族出版社。
- 程 博 2012 《壮侗语数量名结构语序探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4期。
- 戴庆厦、蒋 颖 2005 《萌芽期量词的类型学特征——景颇语量词的个案研究》,李锦芳主编《汉藏语系量词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多杰东智 2005 《藏语安多方言中的量词》,李锦芳主编《汉藏语系量词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管燮初 1981 《西周金文语法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 黄布凡 1990 《扎坝语概况》,《中央民族学院学报》第4期。
- 黄 平 2012 《汉藏语数量名结构语序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贾琳瑛 2012 《金平傣语量词研究》,云南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蒋 颖 2006 《汉藏语系名量词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蒋 颖 2008 《普米语个体量词及其类型学分析》,《民族语文》第5期。
- 克原秀 2011 《德宏傣语修饰语的语序探析》,《云南民族大学学报》第3期。
- 李 明 2007 《西双版纳傣语量词研究——兼与汉语对比》,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李宇明 2000 《拷贝型量词及其在汉藏语系量词发展中的地位》,《中国语文》第1期。
- 李云兵 2005 《论语言接触对苗瑶语语序类型的影响》,《民族语文》第3期。
- 李云兵 2008 《中国南方民族语言语序类型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刘丹青 2002 《汉藏语言的若干语序类型学课题》,《民族语文》第5期。
- 刘世儒 1965 《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北京:中华书局。
- 龙耀宏 2003 《侗语研究》,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
- 陆绍尊 1986 《错那门巴语简志》,北京:民族出版社。
- 罗安源 2005 《松桃苗话描写语法学》,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马学良 2003 《汉藏语概论》,北京:民族出版社。
- 毛宗武、蒙朝吉、郑宗泽 1982 《瑶族语言简志》,北京:民族出版社。
- 毛宗武、蒙朝吉 1982 《博罗畲语概述》,《民族语文》第1期。
- 欧阳觉亚 1985 《珞巴族语言简志》,北京:民族出版社。
- 欧阳觉亚、郑贻青 1980 《黎语简志》,北京:民族出版社。
- 潘悟云、陶寰 1999 《吴语的代词》,李如龙、张双庆主编《代词》,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 〔日〕桥本万太郎 1985 《语言地理类型学》,余志鸿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覃晓航 2005 《关于壮语量词的词头化》,《民族语文》第3期。
- 施其生 1996 《广州方言的“量+名”组合》,《方言》第2期。
- 孙宏开 1981 《羌语简志》,北京:民族出版社。
- 孙宏开 1983 《六江流域的民族语言及其系属分类——兼述嘉陵江上游、雅鲁藏布江流域的民族语言》,《民族学报》第3期。
- 孙宏开、胡增益、黄行 2007 《中国的语言》,北京:商务印书馆。
- 田德生 1986 《土家语简志》,北京:民族出版社。
- 王辅世 1985 《苗语简志》,北京:民族出版社。
- 王均、郑国乔 1980 《仡佬语简志》,北京:民族出版社。
- 王力 1980[2004] 《汉语史稿》(重排本),北京:中华书局。
- 韦学纯 2011 《水语描写研究》,上海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吴启禄 1983 《布依语量词概略》,《贵州民族研究》第3期。
- 吴启禄 1992 《贵阳布依语》,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
- 徐丹 2009 《下游史兴语的某些特点》,《民族语文》第1期。
- 徐琳、木玉璋、盖兴之 1986 《傈僳语简志》,北京:民族出版社。
- 徐琳、赵衍荪 1984 《白语简志》,北京:民族出版社。
- 徐悉艰 1987 《景颇语的量词》,《民族语文》第5期。
- 杨将领 2011 《独龙语个体量词的产生和发展》,《民族语文》第6期。
- 翟会峰 2011 《三官寨彝语参考语法》,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张济民 1993 《仡佬语研究》,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
- 张景霓 2005 《毛南语的量词短语》,李锦芳主编《汉藏语系量词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张均如 1980 《水语简志》,北京:民族出版社。
- 张元生 1993 《武鸣壮语名量词新探》,《中央民族学院学报》第4期。
- 张元生等 1985 《海南临高话》,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
- Greenberg, J. H. 1972. Numeral Classifiers and Substantival Number: Problems in the Genesis of a Linguistic Type. *Working Papers in Language Universals* 9: 1-39. Stanford University.
- Greenberg, J. H. 1975. Dynamic Aspects of Word Order in the Numeral Classifier, In *Word Order and Word Order Change*, ed. Charles Li, 27-43.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惠红军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710119)